

一个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
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选批

上海钟表元件厂工人理论小组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条例》），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亲自策划炮制的。它是工业战线上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一面黑旗，是一份不可多得反面教材。《条例》秉承邓小平的旨意，狂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疯狂反对“鞍钢宪法”，推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挥舞“整顿”的大棒，妄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这是一个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

对于这个修正主义《条例》，我们厂的广大工人和干部联系工业战线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逐条逐款地进行了剖析和批判。通过批判，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邓小平修正主义经济思想的反动实质和他的洋奴买办的丑恶嘴脸，推动我们把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

搞“现代化”是假，反对革命化是真

【原文】

“我们要在争取到的时间内，紧张地扎实地工作，不要把时间浪费掉了，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全党全民都要……为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而斗争。”

【批判】

这是《条例》前言中的一段话。它只字不提党的基本路线，只讲发展，不讲方向；只讲速度，不讲道路；打著“现代化”的幌子，反对革命化，是十足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提出今后二十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时，首先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然后又反复强调“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革命统帅下，努力增加生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并着重指出：“各级领导同志，在抓经济工作的时候，务必十分注意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抓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而在

《条例》的前言里，这些十分重要的话都不见了，革命统帅生产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被抽掉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四个现代化”的空壳。邓小平只讲“现代化”，不讲革命化，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条例》攻击我们“把时间浪费掉了”，似乎只有邓小平是要高速度的，而我们是不要高速度的。问题根本不在于要不要高速度，而在于以什么为纲，沿着什么道路使社会主义工业高速度发展。列宁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442页）按照邓小平这一套搞下去，社会主义经济不但不能“高速度”发展，资本主义复辟却一定会大大加快！无怪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再狂妄叫嚣“四个现代化日”要“设酒重祭”。他们所谓的“四个现代化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得逞之时；他们所谓的“重祭”，就是革命人民人头落地。《条例》打出“高速度”、“现代化”作幌子，目的是掩盖它力图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用心。

以目乱綱，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綱

【原文】

“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这个总纲。”

【批判】

《条例》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打出“三项指示为纲”并把它说成是什么“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毛主席最近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重

要指示，是对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有力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出笼，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在去年五月、七月，他把“三项指示”说成是“一个时期的纲”；到八月，又说成是“一切工作的纲”；到了八、九月，在炮制的《条例》中竟说成是“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几次修改，不是将邓小平有纲领、有计划、有目的、有部署地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暴露无遗了吗？

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实质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翻版。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就拿我们厂来说，从一九六〇年由金笔厂改建为钟表元件厂以来的十六年中，阶级斗争的风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例如，钻石打眼是个老工艺，工人早在一九六三年就提出要用激光打眼的新工艺代替老工艺。但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有些领导崇洋迷外，不接受群众的建议；后来勉强搞起来了，也只是靠少数专家关门搞试验，结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挫伤。直到一九七一年批修整风中，群众狠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和专家治厂的修正主义货色，才把这项新技术搞成功。事实证明，放弃阶级斗争，不批判修正主义，要想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是根本不可能的。

【原文】

“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是紧密联系的，是一个整

体，执行三项指示，就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执行党的团结、胜利路线……不注意生产，不努力搞好生产，把生产放在可有可无，可重可轻的地位，也是要不得的”。

【批判】

《条例》把执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说成“就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执行党的团结、胜利路线”，把三条路线并列，这就彻底篡改和否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制定的，其核心是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的团结、胜利路线是受党的基本路线制约的。《条例》鼓吹“一纲即三线”，不分主次地并列起来，其目的是要从根本上篡改党的基本路线，保护党内资产阶级过关，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有什么基本路线可言？不抓阶级斗争，就不可能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谈不上执行党的团结、胜利路线。不要党的基本路线，不讲阶级斗争，只强调埋头生产，这就是唯生产力论，这必然会滑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

誣蔑大好形势，意在反攻倒算

【原文】

“企业不得安宁，地方不得安宁，党不得安宁，阶级敌人趁机混水摸鱼，大捞一把，有的甚至篡夺了领导权，他们打

着反复旧的旗号搞复旧，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把党的好干部，把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打下了台，坏人当道，好人受气，这些地方，这些企业，管理混乱，生产长期上不去，有的已经变了质。”

【批判】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交战线出现了一派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这是有目共睹，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可是《条例》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大好形势说成“一团糟”，其用意就是要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仍然激烈地进行着。所谓“不得安宁”的现象是有的，其根源是一小走资派在挑动，正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革命人民战胜走资派的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不会停止的。我们要正告邓小平：只准你们搞复辟倒退，不准革命人民造走资派的反，那是痴心妄想！但是，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却被《条例》说成是“把党的好干部……打下了台，坏人当道，好人受气”。为什么他们要颠倒是非，倒打一耙？恩格斯说得好：

“对一些人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1页）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就感到很不舒服，要反攻倒算，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然而，“翻案不得人心”。妄图开倒车的人，其结果只能被滚滚向前的革命车轮辗得粉碎。

“整顿党的领导”，就是向无产阶级反夺权

【原文】

“整顿企业，首先要整顿党的领导。”

【批判】

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群众手里，还是被走资派所篡夺？这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党会不会变质，国会不会变色的大问题。无产阶级历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走资派自然也不放松这一点。所以，《条例》要把“整党的领导”这一条放在十分显要的位置，其目的就是要篡夺党的领导权，强力推行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强调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一次强调指出：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邓小平要“整顿党的领导”，口口声声“要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作斗争，却绝口不提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而把矛头对准三结合的革命领导班子，蓄意转移斗争目标，搞篡党夺权。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同走资派的斗争。

【原文】

“经过整顿，要改变那些‘软、散、懒’的领导班子，调整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使领导权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

【批判】

《条例》一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新生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污蔑成“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软、散、懒’的问题”，把敢于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广大革命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污蔑为“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勇敢分子”，一面杀气腾腾地叫嚷，要把“权力夺回来”，妄图“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各级领导班子中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统统打击、排挤出去，让那些敢于“拚老命”、“不怕第二次被打倒”、坚持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重新上台，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向无产阶级反夺权又是什么呢？

“依靠”是幌子，压制是真意

【原文】

“现在有的地方，有些单位并不是这样。他们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他们不作阶级分析，盲目地跟着‘造反派’和‘反潮流分子’跑，结果，分裂了工人阶级队伍，脱离了广大工人群众。”

【批判】

在《条例》第三条中，煞有介事地写上了“依靠工人阶

级”的条文，联想起邓小平在去年大刮右倾翻案风时，曾经说过“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谬论，岂不是自相矛盾，咄咄怪事吗？其实也不怪。坏坯子里浇不出象样的产品，走资派哪有依靠工人阶级的道理！只要细看一下条文的实际内容，就不难看出，邓小平所谓的“依靠工人阶级”，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局。《条例》一会儿讲对革命造反派要“警惕”，防止他们“搞破坏活动”；一会儿又讲对革命造反派要“坚决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并且要“严肃处理”。这就清楚地看出，邓小平讲的“依靠工人阶级”，实足是骗人的鬼话。邓小平依靠的是哪些人呢？不用说，就是那些要算文化大革命帐、翻文化大革命案，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对立地位，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还乡团”分子。

【原文】

“要划分造反派、反潮流分子和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界限，不能说参加过反潮流，参加过造反的人，都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

【批判】

反潮流是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的体现。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党幸也明确规定：“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反潮流的阶级内容，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潮流，造资产阶级的反。因此，反潮流是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实践证明，只有坚持这样做的同志也才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而《条例》的炮制者别有用心地把敢于造走

资派反的同志同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割开来、划出来，这花清楚地表明他们心目中的“先进分子”只能是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跑的人，而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则是准备算帐的，他们保护谁，镇压谁？泾渭分明。这也再次暴露了邓小平这个复辟狂的凶残本相。

办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是我们党的阶级路线，也是贯彻“鞍钢宪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拿我们厂来说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全厂九科一室就有六科一室的领导权被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权威所把持，使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压制。正如有些同志说的那样：

“厂长门槛三尺三，工人无权莫进来。一个萝卜一个坑，工人只做不能啃。”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厂广大工人群众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造了走资派的反，夺了走资派的权，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得到确立，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断高涨。这些年来，厂党委进一步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发扬工人群众的革命精神，因而在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顶住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创造了许多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使厂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回顾我们厂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深深地懂得，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就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只有发扬广大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积极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粉碎资产阶级的复辟迷梦，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高喊“整顿”，意在改变社会主义企业方向

【原文】

“必须在整顿和加强领导班子的同时，整顿企业管理，严格规章制度。”

“一概反对企业管理，反对规章制度，势必造成无政府状态。”

【批判】

在邓小平及其《条例》炮制者看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企业管理“混乱”得很。他们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架势，声嘶力竭地高喊要“整顿”，而且要“严”，要“矫枉必须过正”，充分暴露了他们要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还乡团”嘴脸。

毛主席指出：“管理也是社教。”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鞍钢宪法”，依靠工人群众把好企业的方向、路线关，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真正落实到基层。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厂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坚决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使人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得到了加强。文化大革命前是“厂长室门朝南开，工人走过绕个弯”，工人同领导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而今许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冲毁了，厂里建立了“两蹲点”的管理制度，“工人请到组室来，理财理管路线”。车间干部也实行了每年定期参加班组劳动两个月的制度，“三结合”的群众管理小组一个又一个地建

立起来，使干群之间的新型关系不断巩固，群众管理越管越好。但是，《条例》却避而不谈企业管理的阶级实质，高喊什么“整顿”，其目的就是要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方向，用“管、卡、压”的一套强化和扩大在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让干群关系变成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秩序”。谁如果破坏了这种“秩序”，就是“无政府状态”，就是“反对企业管理”。由此可见，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一律撤销” 就是反对工人阶级

占领上层建筑领域

【原文】

“现在有些企业，设立了一大堆脱产的体育队、文艺宣传队、民兵、写作班子等等，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差事，使许多年青力壮的工人脱离生产第一线，使企业非生产人员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所有这些脱产的专业队伍一律撤销。”

【批判】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现全面的专政”。遵循毛主席这一教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开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管路线，管方向，打破了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使上层建筑领域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变化，有力地巩固了社会主义的

经济基础。这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广大工农兵。无不为此而欢欣鼓舞。

然而，我们高兴，敌人跳。跳得最凶的一个，就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条例》的上述条文中，邓小平菊尽全力发泄对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怨恨，发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仇恨。在他的嘴里吐不出一个“好”字来，什么“体育队，文艺宣传队、民兵、写作班子”，统统“搞糟”了，非得“一律撤销”不可。工人群众说得好，邓小平这种人，对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总是“看看不顺心，想想不称心，，横下一条心，整光才开心”。

说穿了，邓小平挖空心思找出种种理由，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一律撤销”我们工人当家作主的权力，只准工人群众做机器的奴隶，不许工人管理国家大事。这样，就能够让资产阶级重新专无产阶级的政，顺顺当当地复辟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力，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邓小平鸡蛋里面挑骨头，想来卡我们。那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非但不能把我们从上层建筑领域赶跑，相反地只能更加坚定我们搞好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决心和信心。

鼓吹“核心”，包藏祸心

【原文】

“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没有严格的资任

制，生产只能打乱仗”。

【批判】

搞社会主义生产，要有责任制。但是，我们所讲的责任制，首先必须有利于发挥工人群众的主人翁作用，有利于调动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利于工人群众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可是，邓小平却把责任制强调成规章制度的

“核心”，其险恶用心就是要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想用责任制来卡我们，要我们工人“一个钉子一个眼”地干活，只讲分工，不讲协作；只顾局部，不顾整体；只埋头生产，不关心政治。归根到底，是要剥夺工人群众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权、发言权和领导权，使工人重新沦为分工的奴隶，雇佣制的奴隶，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奴隶。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厂批判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鞍钢宪法”，狠抓阶级斗争，大破雇佣观念，既坚持了必要的岗位责任制，出色完成本职工作任务，又冲破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做到“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份内事拼命干，份外事抢着干”，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全厂出现了革命热气腾腾、生产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全厂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三。这就充分说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邓小平声嘶力竭地把责任制说成是企业管理的“核心”，他所包藏的祸心，就是妄图把被人民群众批得体无完肤的修正主义黑货重新搬出来，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此，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

搞“独立指挥系统”，为的是复活“一长制”

【原文】

“所有企业，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强有力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负责管理指挥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及时处理生产中出现的問題，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批判】

社会主义企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企业管理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是，邓小平却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外，另行建立一个所谓“强有力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这里要特别注意“独立”两个字，这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领导架空。可见，他讲“党委统一领导”是假，向党组织闹“独立”是真，其目的就是要复活“一长制”，恢复文化大革命之前“一长挂帅、四总当家”的局面，安图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邓小平明目张胆地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对于他的这种罪恶企图，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回击。

借“集中统一”之名，行“条条专政”之实

【原文】

“现在，许多地方的工业管理机构不健全，业务人员太少，不能适应下放后的形势，许多事情没有人管，生产调度工作抓不起来，影响生产的发展，这些地方，要迅速建立和

健全必要的管理机构，切实地把生产管好。”

【批判】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毛主席的指示，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在经济建设中的运用和发展。但是，长期以来，那小平总是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对帝国主义托拉斯的“集中统一”推崇备至，对地方的积极性大泼冷水，热衷于搞“条条专政”。

文化大革命中，工交战线广大工人群众和革命干部奋起造了“条条专政”的反，使毛主席的正确方针得到贯彻落实，工业管理体制得到了改革，下放了部分中央企业归地方管，这对于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对于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大的意义。可是，邓小平精心策划和意炮制的这个反动《条例》，却闭着眼睛说略话，大叫什么这是“不健全”、“没有人管”、“抓不起来”。于是乎，邓小平就亲自出马，露骨地鼓吹要把所谓“关性的为全国服务的需要全国组织协作的企业”“收上来”。十分明显，邓小平是浩“革中统一”之名，行“条条专政”之实。如果依了邓小平的主意，地方的积极性就要被扼杀，这就等于脚走路。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势必成为一句空话。

【原文】

“中央各部要和地方一道做好下放企业的交接和管理，不能撒手不管，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建成全国的工业体系”。

【批判】

所谓“不能撒手不管”，这是邓小平一的自供状。邓小平重新工作后，不是一心要把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走资派安插到各个部门，妄图让他们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篡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权吗？所以，《条例》所指的“不能撒手不管”，无非是要由中央主管部门中的少数人直接对企业发号施令，说穿了就是要取消各级党组织对工厂企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中间闹分散主义，搞“多中心”，对地方、对群众搞专制主义。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统一经济，就会被瓜分成一行一业“条条”的私产。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就会敲锣卖糖，各管一项，些至以邻为壑，互相拆台。这样搞下去，企业的领导权必然要旁落到走资派手里，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名存实亡，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工人群众说得好：“条条专政”是从刘少奇、林彪那里拾来的“破烂货”，是从苏修那里贩来的“进口货”。我们要同邓小平对着干，就要坚决批判这种修正主义的“冒牌货”。

立足“引进”，十足爬行

【原文】

“世界上工业落后的国家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要这样做。”

“必须虚心地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有计划重点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为我所有，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

展速度。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但是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

“对于引进的外国的先进技术，……也要反对没有学会就乱改乱动。”

【批判】

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迅速地发展国民经济，主要是靠抓革命，促生产，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邓小平却从唯生产力论出发，鼓吹“技术决定一切”。在他看来，我国是没有先进技术的，只有西方资产阶级才有。于是，他公开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把引进外国技术作为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先决条件，一头跪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脚下，活现出一副洋奴相。

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而邓小平却说：“小孩出生后，总是先爬后行”，“我们爬得还少，还要爬”。这就是他的立足点。《条例》中虽然也装模作样地说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这不过是虚晃一枪。你看，它紧接着就气势汹汹地把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攻击为“闭关自守”；把我们坚持自力更生，诬为“夜郎自大”；把我们坚持洋为中用，斥之为“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其实，按照邓小平的主意，就是要实行“门户开放”，跟在洋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把我国的经济命脉系在西方资产阶级的腰带上。对外围的技术只能顶礼膜拜，而不准“乱改乱动”，以此来压制工人的积极性，束缚工人的手脚，让人家卡我们的脖子。

在这方面，我厂二车间马脚工段的同志是深有感触的。在我厂转产初期，面对着质量要求较高的手表马脚占，我们要试制，而走资派却不让干，硬是从苏修进口。但进口来的又是什么呢？是一批不能用的废品占。工人同志十分气愤地说：

“路是人走出来的，人家能造，我们也能造，决不能让他们幸着我们的鼻子走，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造出争气占米。”工人同志动脑筋、想办法，因陋就简，土法上马，进行了几百次试验，就是用被苏修专家断定不能造出马脚占的简陋设备，造出了马脚占。经过文化大革命，成本又从转产时的一百八十元下降到三分钱。这一事实，是对邓小平的洋奴哲学、爬行立义的有力批判。

邓小平推行一味追求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卖国主义路线，报本不是要加快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而是阻碍和破坏国民经济的发展，妄图使我国沦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这一点上，历史的创痛早已教训过我们。邓小平这个现代“西崽”还想要走老洋务派的老路，开历史的倒车，这是我们所决不能答应的。

强调“物质条件”，是为了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原文】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仅现在不行，将来也是行不通的。”

【批判】

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

件和精神条件”，这完全是邓小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的谬论翻版。其实，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只能作为考虑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到什么程度的因素，报本不能作为能不能限制的前授，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情况就是最好的证明。邓小平如此强调“物质”，无非是用所谓“基础”、“条件”来蒙人们，以便扩火、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如果要讲条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广大工人的共产主义觉悟。就拿我们厂来说吧，正是依靠广火工人群众不计报酬地忘我劳动，为国家创造财富，才使今天的钟表元件厂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七个厂。邓小平为了扩大等级差别，还混淆视听，别有用心地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是“搞平均主义”。其实质，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开绿灯。

【原文】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义原则。在现阶段，它是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坚决实行。不分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不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批判】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是，“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因此，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然而，邓小平却片面强调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面，避而不谈它是产生资产阶级的

球，必须加以限制的这一重要方面。在邓小平看来，千多少活，就要拿多少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他公开鼓吹要用“三劳”来向党和人民“多捞”。可见，邓小平是一个十足的利欲熏心的夏洛克式的人物。

不仅如此，他还要用这一套物质刺激的黑货来腐蚀我们工人群众，以此来调动什么“积极性”。其实，靠“物质刺激”调动起来的这种“积极性”，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钱炼的革命群众面前，邓小平显得何等反动，何等渺小！

所谓“专心致志”，实质是鼓吹白专道路

【原文】

“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都应当给予信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对他们的成绩，要加以肯定。”

【批判】

邓小平重新工作后就大叫大嚷：“就是白专，有一点子有什么！应该爱护、赞扬”；“搞科研的允许是书子”。于是、《条例》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鼓吹要让人“得以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言下之意，文化大革命搞得和知识分子无法“专心致志”地进行研究工作了。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毒攻击，是别有用心地批拔党和知识分子的关

系。

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好得很！正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使各条战线的知识分子走出高楼深院，与工农相结合，与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在政治思想和业务技术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可是，邓小平却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明明是广大知识分子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而他却把这污蔑成为不能“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可见，他所谓的

“专心致志”，就是要知识分子象文化大革命前那样，把自己关进高楼深院，“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头扎进故纸堆里，一心追求名利地位，致力于爬资产阶级的“象牙之塔”。一句话，就是鼓吹走白专道路。这哪里是什么“关心”、“爱护”，分明是对知识分子的引诱和坑害。倘若听信了邓小平那一套，那末，知识分子就会变成同工人、贫下中农处于尖锐对立的精神贵族，成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殉葬品。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决不能上他的当，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